

咸使知闻”下，连写一“难”字。在“难”字下，《集注》引陆善经注说：“难，诘问之。”然后换行，题写《难蜀父老文》，再换行，题“司马长卿”。这样的格式很明显是以“难”为单独的文类的。至此，《文选集注》为我们证明了，即使李善注本，“难”也是单独列类的。《文选》三十九类之说遂得到了全部所需要的证据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《文选集注》约产生于唐末，因为有避唐讳字（如“民”、“渊”等）可以证明。其书最初藏于北宋藏书家田伟处，不知何时传至日本。世人（包括罗振玉）所说此本或出自日本人之手的说法，其实是错误的^①。从《文选集注》看，李善注本在唐末尚未发生错谬，那么致错的时间当从唐末到北宋仁宗天圣朝这一段时间，这对我们研究李善注本的传承演变，又连缀了一些十分可贵的线索。

^①参见邱荣霖《今存日本之〈文选集注〉残卷为中土唐写旧藏本》，载台湾《中央日报》1974年10月30日第10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大学中文系

魏徵籍贯辨

卢华语

唐初杰出政治家、史学家魏徵的籍贯，史籍记载颇有歧异，今人论述率多纷纭，似有辨析的必要。

籍贯指祖上所居或个人出生地；古人重郡望，又往往以郡望为籍贯。祖上所居、郡望和出生地，对某一个人来说，有的可能一致，而更多的则往往不一致，于是史籍载笔记同一人的籍贯便

常各有不同，魏徵的情况就是这样的。

《旧唐书》本传载魏徵“钜鹿曲城人也”；《新唐书》本传作“魏州曲城人”。查两《唐书·地理志》，无论邢州（天宝元年更名钜鹿郡）还是魏州都没有“曲城”。据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载：魏氏始祖毕万为晋献公大夫，封于魏，因为魏氏。毕万24世孙魏歆字子胡，汉时为“钜鹿太守，初居下曲阳。”此说可信，有魏收《魏书》为证。《魏书》卷104《自序》云：魏歆“位终钜鹿太守，仍家焉。”在重门第的鼎盛时期，魏收述自己的家族谱系当不会有误。又《魏书》卷106《地理志》载：钜鹿郡领县三，曲阳为其一。注云：曲阳“二汉、晋属赵国（应为钜鹿郡），曰下曲阳，后改。”“曲阳”为何改名为“下曲阳”？《汉书》卷28《地理志》颜师古注：“常山有上曲阳，故此云下。”显然，两《唐书》所谓的“曲城”系“曲阳”之误。钜鹿下曲阳为魏氏世代所居，魏子建（魏收之父）在北魏时官左光禄大夫、加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，卒赠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；魏收在北齐时加开府，兼右仆射，死后追封司空、尚书左仆射，故钜鹿乃魏氏之郡望。唐人亦重郡望，李延寿撰《北史》，将魏长贤（魏徵之父）与魏收合传，均作钜鹿人，其实长贤一族早已迁居别处了（详见后）唐初人称魏徵亦多作钜鹿人，如杜淹《文中子世家》等，均指郡望。

又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载：魏徵出馆陶魏氏，由其五世祖魏珉（汉兖州刺史魏衡曾孙）“始居馆陶”。大业中，魏徵“诡为道士”，曾游馆陶，在此遇到薛收，一起去河东，曾与王通讨论《六经》（《文中子·周公篇》）；馆陶在隋时属武阳郡，“大业末，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以应李密，召（魏）徵使典书记”（《旧唐书》本传），也许其时魏徵正在馆陶。或以魏徵为馆陶人，实乃指其祖籍。

另《北史》卷56《魏长贤传》载：“兄伯胤之归也，留长贤与弟德振，使宦学于洛中。孝静北迁，亦徙居邺。”“孝静北迁”，事在公元534年，北魏分裂，高欢立元善见为帝，将都城由洛阳迁

至邺城（今河北临漳县），是为东魏。魏长贤在东魏曾任某某王参军事（《北史》作“汝南王〔元〕悦”，误。元悦于永熙末为元修所害，不及东魏）；入齐，先为平阳王高淹辟为法曹参军，后转著作佐郎，因在都城做官，故将家迁到邺定居，也是自然的事。然吴兢（670—749）撰《贞观政要》称“魏徵，钜鹿人也，近徙家相州之内黄（今属河南。此当指其父魏长贤迁居）。”吴兢武周时即入史馆，编修国史，坚持实录，有唐代董狐之誉。兢于开元间撰《贞观政要》，距魏徵去世不到百年，述魏徵籍贯称“近徙家相州之内黄”，其说无疑有据。魏长贤本已在邺定居，为何又迁内黄？主要原因恐是大象二年（580）六月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讨杨坚，七月兵败，杨坚毁邺城，为避兵灾，魏长贤将家再迁内黄，魏徵即于是年出生于此，故魏徵死后，赠司空、相州都督。

由上可见，钜鹿是魏氏郡望，馆陶为魏徵祖籍，内黄是其出生地。今人称魏徵或钜鹿人、或馆陶人、或内黄人，其说均有据，各有所指而已。

然《四川文物》1987年第2期载杨仕甫先生《魏徵生地质疑》称：魏徵生于四川省剑阁县武连镇。此说似尚需斟酌。

杨先生论证所据历史遗物：

1. 始建于唐代的武连觉苑寺大雄殿内现存一座于唐元和十年（815）六月镌刻的石灯台；其上有“魏公政，邑之大族，折节为吏”的记载。这只能说明在唐元和间武连镇已有魏姓家族，不一定能说明从“唐代开始，这里便有魏姓家族”，因为唐初到元和，其间有近二百年的时间距离。这还不是问题的肯綮，关键在于魏政与魏徵，分明两人。魏政是“邑之大族”，而魏徵“少孤贫”，现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他们之间有任何关系。

2. “魏徵府的插旗面（疑应为‘石’）”，原物已不存，乃几位老人的回忆；即使刻有“魏徵府”三字的方石确系唐代遗物，若无其他旁证，也只说明此魏徵乃武连魏徵，不一定是钜鹿魏徵，同名同姓，古今多有，未必就是一人。如今，问题的核心正在苦

于没有材料能将武连魏徵与钜鹿魏徵联系起来。

3. 武连镇发现的清代石碑刻有“魏文贞公故里”七个大字，这无疑明确指“钜鹿魏徵”，然反映的仅是清代武连人的一种说法，未必就是事实。清人说唐人事，若无新的原始材料发现，绝不会比唐人说唐人事可信。

4. 清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所修之魏公祠，现祠庙已毁，仅存石碑一通，述魏公祠之源起。然从杨先生引文看，此魏公究系何人，尚不得而知；即使确指魏文贞，也只是清人的看法而已。

又杨先生所据历史文献：

1. 曹学佺《蜀中名胜记》卷26记载：“《志》云逍遥楼废址，在武连旧县，唐颜真卿匾三大字碑刻在焉。元改武（连）县学为魏公书院，以唐魏徵所生之地也，学正王惠为之记。”这段引文明确指出，把武连镇作魏徵出生地，始于元代。其作俑者，盖元人忽鲁大都与李义甫等（清道光《保宁府志》卷27）。

2. 清雍正《剑州志》载：“唐魏徵，州之西凤凰山，传以为徵之生处。”清同治《剑州志》载：“凤凰山在武侯坡东，传为魏徵生处。”这两段引文特别指出“传以为”、“传为”，正表明清代剑州人也并不认为唐魏徵就一定出生于剑州。

3. 清道光《保宁府志》载：“魏徵出生于剑州武连县凤凰岩。”论剑州事，雍正时剑州人不完全相信，而道光时保宁人（清代剑州属保宁府）却信以为真，这就难免有以讹传讹之嫌。

上述历史遗物及文献表明，所谓魏徵出生武连之说，起于元代，盖由元人附会，因魏政之“政”与魏徵之“徵”，今音相同，古音相近，均为下平声。“政”诸盈切，韵属八庚；“徵”陟陵切，韵属十蒸，故将“魏政”误为“魏徵”。其实，考证魏徵出生何地，关键在于其父魏长贤是否到过该地或有可能到过该地，否则魏徵无可出生。按魏长贤早年宦学洛中，后出仕东魏、北齐，因病辞官，晚年在家闲居养病，从未来四川，也没可能来四川，因此魏徵不可能出生在四川剑阁县武连镇。

国人尊崇有功国家民族的历史名人，欲与先贤往哲攀亲，其善良愿望未可厚非，然以为信史，就不一定恰当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

有关唐初校书的一则墓志的分析

张 固 也

近读《唐代墓志汇编》，发现一则有关唐初校书的墓志，有助于解决目录学史上的一桩千年公案，即唐初校书是否编撰有国家藏书目录？兹先将其主要文字引述于下，并略作分析，以就正于学界同仁。

唐故益州大都督府功曹参军事张君墓志铭并序

府君讳玄弼，字神匡，范阳方城人也。夙阅游宦之资，详之碣文别传。五岁而孤，志学，伏膺于大儒谷那律。律为谏议大夫，调书秘府。府君以明经擢第，随律典校坟籍。八儒分畛、五墨殊途。刘歆析九流之区域，郑默辨三阁之异同。五十五部，四十四家。访宁溯之新书，礼穷庄敬；览南阳之统论，易尽精微。緘箴秘文，委壶前记，并登秘府，一以贯之。逸思烟回，清飏霞举。言同神遇、理叶天成，七徙职为益州府功曹参军事，以贤名征，册入甲科，未拜职，以龙朔元年五月十九日终于洛阳。春秋五十有五。（下略）

墓主张玄弼，两《唐书》无传，以其子张柬之后相武后中宗，故得载名于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》。谷那律两《唐书》入《儒学传》，“大儒”云云，殆非虚誉。史传叙其生平，极为简略，没有提及他“调书秘府”一事。其迁谏议大夫的具体年份，也不得而